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〇七期 ——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10f)

|                                  |     |
|----------------------------------|-----|
| 【史实考证】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 杨正泉 |
| 【人物春秋】陈阿大沉浮录                     | 霞 飞 |
| 【百家争鸣】林彪事件的疑问                    | 朱长超 |
| 【追忆前辈】王年一同志是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阎长贵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史实考证】

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 杨正泉 •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想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他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

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3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3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5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飚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戴临风）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见《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杨正泉《我与广播》）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他：“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在时间上相近，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四人帮”？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1977年10月18日的回忆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四人帮”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四人帮”逮捕的（《我的1976》）。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6日）晚上7点多，不到8点”。显然，他们是在抓“四人帮”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10

月18日那次讲话的统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四人帮’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四人帮’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四人帮”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的“晚上将近10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回忆录》）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华国锋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不准确，事实上耿飚并没有“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四人帮”。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摘录如下：

武建华说，10月6日晚上7点55分，先抓了“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后抓了姚文元。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他说：“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华国锋告知他们，我们对‘四人帮’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华国锋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10月7日晚邓岗传达华国锋亲笔信的记录，华国锋手谕的全文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10月6日晚8点30分粉碎“四人帮”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依然是个难以说清的谜。

◇ 邓岗是在什么时间召集局各部门领导会议的？

耿飚等人进局后，首先向邓岗出示了华国锋的亲笔信，然后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也包括了局的全体领导成员。我不是局核心小组成员，当然也无从知道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通知“中央三台”和各局机关、单位的领导11点去开会。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室在局总编室，如前所述，与邓岗的办公室对门。晚上11点零5分，局长邓岗和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副局长顾文华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邓岗宣布了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立即清查节目，明天的广播电视中不准再出现。会议时间不长，但很重要，与会者事前已感受到局内异样的气氛，听了邓岗的布置自然会敏锐地觉察到发生了大事。为什么是晚上“11点零5分”？因为邓岗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5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次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23点40分（注：晚上11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23点40分，我召集了中央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设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铨、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前的两个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与广播》）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华国锋报告了平安无事。

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铨、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铨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我的记述不具体。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华国锋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铨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11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但耿飚说，冯、

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说，“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但张香山在文章中却用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铨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伴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二集）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伴他们”参观的“局里的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还说：有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些都是编造的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新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过去30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个，也许真实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 《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

~~~~~

【人物春秋】

陈阿大沉浮录

• 霞 飞 •

许多老上海人都还记得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还当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销声匿迹，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踪影？那么，陈阿大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 ◇ 当过工人参加过军

陈阿大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浙江省的绍兴县陶南乡，1942年5月，陈阿大出生。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陈七二给他取名陈阿大。后来，陈七二独自来到上海打零工。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陈七二这样在上海打零工的人也十分重视，将其安排到造船厂，当上了一名正式搬运工。1952年，陈七二将家人接到了上海，1958年，16岁的陈阿大成为上海中华造船厂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部队在上海征兵，中华造船厂也号召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陈阿大也报了名，并顺利通过各项审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这年，陈阿大19岁。

入伍后，部队上分配陈阿大去教导营当饲养员，任务就是养猪？这让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陈阿大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安心在饲养员的岗位上干，而且干得很好。

鉴于陈阿大表现好，部队上又让他当连队的炊事员，陈阿大想方设法为连队改善伙食，受到连长的表扬。入伍一年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并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学习这方面的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手。在训练中，陈阿大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在军事演习中，他们一组士兵曾经取得较好成绩。在退役之前，陈阿大已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春，陈阿大复员回到上海？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陈阿大曾兼任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和民兵排长。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大出生在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根正苗红，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仍受到了重视，“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更细致的事情，他做不来。在“四清”中，他能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陈阿大和年轻人交往密切，有一定的人缘，他利用这个条件，了解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向工作队汇报，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

#### ◇ 造反头目

在参加“四清”工作中，陈阿大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而且他本人也对厂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有些事情厂领导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这样那样的意见。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陈阿大知道厂领导的“问题”多，敢于揭发，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这样，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后来，由他倡议，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造反兵团人数不断增多。陈阿大也就成了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这个造反组织的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并建立了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非常佩服王洪文胆子大，敢冒险；非常佩服王洪文有政治眼光，能抓住政治动向，作出决策；也非常佩服王洪文有组织能力，会笼络人心。而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被王洪文笼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作手下的一员“虎将”。

#### ◇ “武斗猛将”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在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挥造反派卧轨拦车，说是要去北京告状，在这一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率领手下的几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们拦住的第一趟列车，高呼口号，一路向北京进发，无论是谁也劝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车不往前开了，他们才下车。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社严重对立，一场大的武斗一触即发，这时，陈阿大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几千名造反队员，把解放日报社中的“赤卫队”队员团团包围起来，并迫使解放日报社领导作出让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开列的条件，并在“声明”上签字，在这件事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赏有加，多次说，陈阿大在“解放日报”这件事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10万多人，把“赤卫队”3万多人围在康平路，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见人就打，几个人抓一个。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全部“解决”。陈阿大指挥着手下的造反队员，押着“俘虏”，在马路上集中。陈阿大洋洋得意地训话，还要“赤卫队”队员把袖标摘下来，集中了六大堆，然后下令烧毁。陈阿大还把缴获的“赤卫队”的几百箱饼干如数上缴，以表现自己的“清廉”。在这件事中，陈阿大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24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



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又调来灭火用的高压水枪,向“联司”喷射。他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 ◇ 掌权有术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有的稿子,他干脆让秘书和主办会议的单位商量,由主办单位先拿出稿子来,由他的秘书修改,抄清后,他在会上念。

当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后,总要做指示。他的指示,就是几条,他怕话说多了,出漏洞。发表这些指示后,他要求秘书记下来,也要求下边的单位记下来。过几天,他就让秘书打电话问落实情况。如果基层单位忘记了他的指示,或者没有完全按他的指示办,他就会直接打电话,找那个单位的领导,先让他背诵自己去检查工作时的指示,然后再训那个单位的领导。如果连他的指示都背不下来,他就让这位领导“靠边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他的兼职,可不是虚的,这个厂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向他汇报,都要听他的指示。厂里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能任命。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 ◇ 突击入党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内定”陈阿大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安排自己的秘书和陈阿大谈话,暗示他写入党申请书,可陈阿大竟然没有听明白。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了,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以为,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晓得入党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这位常委找陈阿大谈话时,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入党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了吧。最后,这位常委没有办法,干脆点明: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陈阿大回去后立即动笔。可是，他不会写，写个草稿也有不少错别字，只好让秘书代笔修改后，自己重新抄清楚，交了上去。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决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当天，该厂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会上，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先后发言，介绍了陈阿大怎么出身贫苦，怎么从小当工人，怎么当过兵，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等等。接着，由党员发言评论。事先，王秀珍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发言，歌颂陈阿大的功劳。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发展陈阿大入党的会议发言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极力为陈阿大评功摆好。这个说：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那个说：陈阿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先锋，当闯将，担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后，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还有人说：陈阿大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典型。

在这些人发言之后，王秀珍也在会上发言，把陈阿大吹捧了一番。她说：我和陈阿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陈阿大阶级斗争觉悟高，勇挑革命重担，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在王秀珍之后发言，称赞陈阿大有水平，觉悟高，他还一连说了陈阿大“十个好”。

会上决定，发展陈阿大入党。按当时规定，通过之日，陈阿大就是正式党员。陈阿大从写入党申请书，到正式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

陈阿大入党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记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的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 ◇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中共九大后，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上海市工交组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上海政坛上出现了一颗“新星”。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邀请陈阿大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是有会，他必到，到会后必讲话。

陈阿大在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他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王洪文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过去上海人都知道，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及其党羽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就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必要时，就打巷战。他还参与制订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民兵作战方案。陈阿大在向民兵讲话时，公然宣称：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陈阿大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将来王洪文可能会登上中央主席的位置，他们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决定调动3500名民兵集中，3.1万名民兵待命。此时的陈阿大，跳得最欢，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又是检查电台安装情况。

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们上海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艘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搞武装叛乱，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央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

~~~~~

## 【百家争鸣】

### 林彪事件的疑问

• 朱长超 •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是文革史研究中需要解开的一个谜。搞清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理性而科学地认识这个事件，具有深刻的意义。

#### ◇ 一个三十多年前的疑问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接受着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审查。审查了很长时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是，我仍然是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我的一举一动，被认为可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高度保密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没

有一个不知道毛泽东选定林副统帅当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接班人问题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创造。而现在，被选定的接班人与选接班人的人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这对于当时人们创造的“无比英明”、“洞察一切”的神话是个绕不过去的难题。而且当局认为，林彪反对毛泽东是有社会基础的，也会引起社会反应。而我这样的所谓516式的分子和其他的运动对象，都有可能是林彪“资产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因此，我这样的运动对象是不能听林彪事件的文件的。林彪事件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不过，我当时也猜测到了毛泽东似乎与林彪有了矛盾，也了解了林彪事件的大体脉络。

我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战友们面临着一个难解之结：当时，接班人是有着“四个伟大”头衔的毛泽东提议的，毛泽东又是无比英明的，洞察一切的。而林彪据说想发动政变，想谋杀毛泽东。这就是说，洞察一切的毛泽东英明地挑选了一个要谋杀自己的人当了副统帅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兼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林彪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只有毛泽东拉他做自己的亲密战友。事实使充满着灵光的毛泽东陷入无法向天下人解释的难堪：为什么“洞察一切”的毛泽东洞察了一切，唯独没有能够洞察他最信任的革命接班人林彪？后来，历史还进一步证明，“洞察一切”的毛泽东也没有洞察同枕共衾的妻子江青。此是后话。当时，为了自圆其说，向群众宣读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说，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关于政变的讲话，发现了问题，将心中的疑虑悄悄地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他不同意那篇讲话，说是“为了打鬼，借用钟魁”。林是在利用毛，毛也是利用林。似乎毛泽东当时对林彪早有觉察。他老人家还是洞察一切。只是当时是悄悄地洞察一切罢了。

不过，我心里觉得，这还是没有理论说服力，当时我的心里升起了一个疑问：你既然已经从那篇林的讲话中发现了问题，以你的绝对权威，为什么要在九大上选他做接班人呢？为什么又要将接班人资格写进党章，写进宪法修改稿（草案）呢？这不是养虎遗患呢？我怀疑这封毛泽东洞察林彪的信的真实性，稍有点头脑的人，能看得出破绽的。

康生编造的那封毛泽东识破林彪的假信，像一件皇帝的新衣，中国的老百姓齐声赞扬着这件新衣的漂亮，不过，很多人都知道那件新衣也只是一件空落落的“皇帝的新衣”。周恩来似乎也看穿了那件新衣。不过他自然不会说。他是个老道的政治家。毛泽东似乎心里也有点不踏实，有一次问周恩来信不信那封信，城府很深的周恩来顾左右而言它，做出似信非信，似不信又信的样子，毛泽东只得自找台阶说，“恩来心里明白。”

洞察林彪的信可以向天下人伪造，林彪的罪状就不可以假造吗？后来，历史又证明刘少奇的罪状是伪造的，彭德怀的罪状是强加的，林彪的罪状就不可以伪造、不可以强加吗？林彪事件是一件真案，还是一起假案？我的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这个疑问有可能遭祸，它留在脑子里，一晃竟有三十多年了。对于天下人来说，这个事件真的清楚了吗？

#### ◇ 林彪的发言有罪吗？

毛、林的分歧，似乎公开于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党的中央会议上，提出国家要有个头，建议国家要设国家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也有这个主张。汪东兴等许多人都有这个主张。林彪的发言，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拥护，几个组的讨论非常热烈。陈伯达也作了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还引经据典地找了不少根据。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等人也支持这种观点。

这一点也不奇怪。第一，家有家长，组有组长，任何机构都要有一个头。国家要有个主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选谁当国家的头是一回事，国家要不要一个头是另一回事。国家自然是要有个头的，不能因为吃饭吃噎了就不再吃饭，不能因为刘少奇当过国

家主席就不再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设主席（或总统等）是全世界的一个通例。第二，在文革中，毛泽东搞了点个人崇拜，当时的毛，在中国人心中是尊神，对他稍有不敬，稍有微言，就是现行反革命。因此，选他当国家主席，在当时是自然的，正常的。这正如在朝鲜选金正日、在伊拉克选萨达姆，都是正常的。

结果，毛泽东认为陈伯达反党，将陈投进监狱。陈伯达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他的文革错误，主要是忠实地执行了所谓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实，这个老夫子早就不想当文革组长了，他当组长，只有挨后台老板、自己又颐气指使的江青的气。但是，林彪却认为他不应该辞去这个职务，不然，江青更加会飞扬跋扈。陈伯达在庐山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毛泽东当国家的主席，这是符合党章的，是没有错的，更没有罪。退一步讲，如果他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在当时也可能获罪。但是，从党章法律的角度讲，也是允许的，也是没有错误，也是没有罪的。他的所言所行，都在党的章程所规定的党员的权利之内，党员都有在党的会议上表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世界上任何政党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何况是在绝对英明正确绝对权威的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因此，陈伯达在庐山的发言是无罪的。林彪的发言同样是无罪的。

毛泽东则认为，陈伯达有罪，黄吴叶李邱有罪，林彪也有罪。毛泽东整黄永胜等人，是向林彪施压。将陈送入监狱，是给林彪上课。他让黄等人回京后检查，他们作了检查。他是要逼林彪检讨。林彪没有检讨，林彪认为自己无讨可检。毛泽东认为，那次会议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他习惯于把一切看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把林彪等人要设国家主席、要他当国家主席的提议，也当成了一次新的严重的路线斗争、新的严重的阶级斗争。

可见，林彪事件，一开始就是由于毛泽东过于敏感的神经引起的。他历来主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庐山会议前不久，他刚打到他的宿敌刘少奇，他认为，新的路线斗争、新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了。解放以后，他批胡适，批胡风，搞反右，批右倾机会主义，搞四清，搞文革，后来又搞到了他选中的亲密战友林彪身上，最后也搞到了跟随他几十年对他忠心耿耿的周恩来身上。他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场胜利接着一场胜利。他渴望运动，他渴望胜利。没有运动，没有胜利，他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失落感，空虚感。他其实是一个病人，一个患上了“阶级斗争强迫症”的病人。当然，他还患上了世界领袖幻想症和其他神经性疾病。有强迫症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地洗手，反复地关门，反复地检查自己的发言稿，似乎不这样，天就要坍下来了，心里就不踏实。毛泽东也患上了这样一种严重的强迫症。他觉得，他的周围都是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消灭了一批，又产生了一批。他活着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挖出来，消灭掉。只有这样，他的精神才会安定下来，他才会有成就感。不然，他就会像洗手强迫症病人那样，如果每天不洗上百遍的手，会坐立不安，会夜不能寐。毛泽东也是这样，不制造出一些新的阶级敌人，不将这些他创造出来的敌人挖出来，他觉得心里不好受，好像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一样。

可见，林彪事件的起因，错不在林彪，不在陈伯达，不在黄吴叶李邱，错在毛泽东。他对权力太敏感了，他太凌驾于党之上，一切以他的好恶为是非。如果他稍有一点民主精神，按照党章办事，可以在庐山会议上与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起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国家的体制如何安排，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如果不能统一，民主表决就行了，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并且把与他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打入了另册，准备一个一个的收拾掉。如果他按照党章，或者按照他以前所说的，言者无罪，林彪事件就不会成为后来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因此，可以说，林彪事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制造的，是中国的缺乏起码的民主政治风气造成的。

### ◇ 林彪有野心吗？

林彪的罪状，似乎主要有两条，一是林彪有野心，有野心的主要表现是想他想当国家主席。想当国家主席的根据又有两个，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上发言要设国家主席。毛认为，他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毛当国家主席，这是假象，其实质是要自己当国家主席。另一个证据是，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林彪真的有野心吗？林彪真想当国家主席吗？

第一，从逻辑上说，这是说不通的。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就定罪说，他就是要当国家主席。这种推定是没有根据的。按照这种推理，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有野心，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以此类推，陈伯达也提出过要设国家主席，他也是有野心，也是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信任的汪东兴也主张设国家主席，按照同样的逻辑，他自然也是想当国家主席，也是有野心了。在庐山会议上，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是相当多数，以此类推，庐山会议多数人有野心，多数人想当国家主席。这样，共产党的中央会议岂不成了野心家会议？中央委员的大多数岂不成了野心家。国家主席只有一个，不可能有那多个国家主席，那么多人想当国家主席，岂不是白日做梦。这个推论是荒谬的，因此，他的前提也是荒谬的。

如果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有野心，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以此逻辑进行推理，以后如果谁提出要设立一个机构，谁都是有野心的证据。比如说，如果谁提出要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此人有野心，他是想当国家顾问委员会的头；如果谁提出要设立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此人也是有野心，他是想当纪委主席。以此推理，除了毛主席，谁也没有资格提出建立某个机构，谁也没有资格建议某个机构要有个头。如果这样，全国的建制只能由毛一人说了算。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逻辑，中国的事情只能由他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决策，一个人办理。11亿中国人，包括几百名中央委员和若干个政治局委员，岂不成了摆设，成了奴才？如果谁提出某个建议，如果不合他的意，就成了有野心的罪证。这在逻辑是说不通的，因此，毛对林的想当国家主席的定罪，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言谈举止，生活起居，他并不想、也不能当国家的头。

1. 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他是个非常虚弱的病人。他不可能有精力当国家的领导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他是一个怕光、怕风、怕水的人。据他的警卫员回忆，他有严重的神经性疾病，整夜睡不着觉。警卫员走得近一点，走得快一点，都会引起空气流动，引起他的惊恐。他住的房间，流不进一缕阳光，也吹不进一丝的风。他听不得一丁半点的水声。对于一个如此疾病的人，权力意味着操劳操心，他的身体是无法胜任的。

2. 他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冲动。他失去了美味的吸引，失去了美色的冲动，失去了财富的冲动。每天只是吃极少极普通的食物。可以说，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中间，他的生活是最朴素的。他吃的食物，与贫下中农的、普通工人的家庭并无多大区别，他吃的是咸菜、毛豆、淡馒头之类的食品，山珍海味与他无缘，他也不喜欢。他也一点不像现在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有那么强烈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冲动，如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等，他们每天在紧张地学习三个代表和邓小平伟大思想之余，在紧张地操劳国家大事之余，还有充沛的精力搞几个小密。林彪似乎早在东北战争期间，就对女色失去了热情。有回忆录说，他的夫人叶群在东北与林彪团聚时，半夜里经常因失望、压抑而哭泣。也许极其紧张地战争运筹压抑了林彪的自然生理，也许是阎

锡山士兵的一颗子弹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也许正是由于他对性的冷淡，叶群才大有怨言。林彪解放后从来没有使用过人民币，他不认识钱。一个对钱、对色、对生活享受如此寡淡的人，是很难有野心，是很难有权欲的。他也肯定知道，他是没有体力、没有心力去操劳国事的。一个没有体力和心力的人，会有当国家主席的心愿吗？一个既没有财富的追求，也没有女色的追求，更没有享受的追求的人，会去费心机追求一个国家主席或副主席的职位吗？不会。何况有毛泽东在，他是不可能当国家主席的。这样一点常识，他会不懂吗？

3. 从林彪的工作状态看，也是缺少野心的。他懒得看中央文件，有些必须他圈阅和签阅的中央文件，他也让秘书代读，代圈，他也懒得开会，几乎不想参加任何中央重要会议，实在不能不参加的，只是勉强地参加。他不想抛头露面。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他就没有参加，是毛泽东在会议中派人接他中途参加的，他不得不去。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坚决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他不在乎毛泽东恩赐给他大权，要是换了别的中央首长，说不定会把写有毛亲笔御批的文件小心供奉、到处炫耀、传之子孙呢！九大的工作报告，他是应命很勉强地去读了一下。读完后回家，叶群对他说，真担心他读错了，他却说，读错得多一点才好呢！如果真有野心，这样的时机，正是实现野心的好机会呢？他对于有利于自己实现野心的御批文件和意味着政治地位的宣读政治报告的事情，如此怠慢、如此忽悠，这样的工作状态，能有野心吗？

第三，从当年他已经有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还有必要去争那个无权无势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吗？没有，没有丝毫的必要。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提议下，在全党代表大会的庄严通过下，在神圣的党章里，他已经是党的副统帅，是铁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了。在当时，他的权力已经仅次于毛了，他还有必要再去争那个没有多少意义的位置吗？在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如此英明的林彪会不从刘少奇的下场感悟到一点什么？还会去争刘少奇空下的位置？在中国，党高于一切，就是设国家主席，林彪也只能当个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比起党的副主席，比起党章规定的副统帅、接班人，更只是一个摆设。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林彪，还会希罕那个国家副主席的头衔吗？似乎不会。

第四，从现在披露的一些事实看，他的行为显示他毫无从政之心，更不要说野心了。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共交谈了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如果真有野心，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他们是不会如此轻松的，也不会如此松散。一定会如毛泽东所说的，会频繁地“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世界上难道有懒于从政的野心家，有几年不见面、不商量工作到的反革命集团吗？

第五，退一万步讲，如果林彪真想当国家主席，他建议设国家主席，确实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就是野心吗？就是犯罪吗？就是反党集团吗？也不是。首先，毛泽东主席历来教导人们说，我们的同志，无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当国家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掏粪也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林彪真想当个副主席，也无非只是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位置而已，就如时传祥找一个掏粪的岗位一样。至少这并不构成犯罪。其次，党章和宪法都规定，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希望自己被别人选举，或者想自己选举自己，都是行使党章和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允许的，合法的。合法的行为怎么成了反党行为了呢？如果这也是反党行为，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全国国庆庆祝会口号清单上自己为自己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岂不也成了反党行为，岂不也成了有野心的证据了？

如果提出设国家主席是有野心的表现，是有罪的，那么，在此之前，国家曾经设过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当过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当过国家主席，难道此前的设国家主席的规定，都是有利于构成反党和犯罪的规定？宪法曾规定要设国家主席，难道宪法的规定是错误的规定？林彪只是提议设国家主席，还没有真正设国家主席，更没有他人或自己真的当上了国家主席或副主席，如果他这样就构成了反党和犯罪，那么，前二届人大中设置了国家主席和有人当上了国家主席，岂不是有人“犯罪”在先？“反党”在先？“野心”在先？如果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设国家主席是犯罪，那么，有人提出设某个部，某个司，某个局，以案例法援引，也构成犯有类似的反党罪，野心罪，所差别的只是罪大罪小而已，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这样一来，全国设置那么多机构，主张设置那些机构的人，岂不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中国就岂不成了野心家的角逐场了？如果这样，借用骆宾王的一句名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中国岂不是成了野心家的天下了？野心家岂不是遍于中华了？这种结论显然是荒唐的。

第六，从刑法规定看，以此定罪林彪，也是于法无据的。中国的刑法规定，是否犯罪以行为为证据，不能以言治罪，更不能探测其内心来定罪。如果我们以某人的动机来定罪，那么，这是违背中国和世界的刑法定罪原则的。因此，退一步而言，林彪即使是真想当国家副主席或国家主席，那也是一个党员正当的权利。每个人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被选举担任党内职务的权利。总之，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发言，并不构成犯罪，也不能构成所谓路线斗争的错误。

最后，从历史的事实看，对林彪所定的野心罪、反党罪，与事实对照，是有出入的。说林彪有野心，有些什么有力的证据呢？据当时的中央文件说，叶群曾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儿摆？”这话叶群是否说过，现在看来未必真实可靠，据吴法宪回忆，这是他在没日没夜的逼供之下按照逼供者的要求提供的口供，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刘少奇专案组定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罪时的证据，都是逼供的产物，逼供下的口供，不能采信。退一步讲，从法律角度讲，即使叶群真这样讲了，这只能作为叶群有野心的证据，不能作为林彪有野心的证据，更不能以此作为林彪的罪证。因为林彪是林彪，叶群是叶群，正如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我们不能把江青的错误当成是毛泽东的错误，尽管他们是几十年的夫妻。我们更不能因为江青参加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而以此作为毛泽东的罪证。路是路，桥是桥，夫是夫，妻是妻。叶群真说过那样的话，也不关林彪的事。这就如江青做了大量坏事，如果毛泽东没有参预、没有知情，也不关毛泽东的事一样。

◇ 毛泽东有没有责任？

林彪事件，不是林彪有野心引发出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是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产物。

第一，在庐山会议上，陈、林等人提出建议，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的，没有任何违反党章的行为，毛将陈伯达逮捕是错误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程序。毛泽东曾经自称他是“癞痢头打洋伞——无法无天”，林彪事件是又一次癞痢头打洋伞的生动表现。中国刑法规定，任何人不得未经司法机关批准加以逮捕，更不能未经法院审理而定罪。更何况，法律也应该保证被判刑者以上诉和申诉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讲，毛泽东这是犯了藐视和践踏法律罪。这个罪，与他对刘少奇以前其他许多由毛制造的冤案的罪责是一样的。如果采用党内民主的方法，这本来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不同认识，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协商、民主决议的办法办理。因此，事件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是毛泽东抡起了大棒，践踏了党内民主，制造了党内纠纷，激化了党内矛盾。林彪事件的发端，是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的处理方式引起的。



第二，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再一次采用了他惯用的“阳谋”的方式，没有采用他口头上一贯主张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他表面上说，要保黄吴叶李邱等军委的几个人，并且批示他们的检查是好的，通过了。背后他又说，要对他们“掺沙子”“抛石头”。他对这些人当作敌人来处理的。毛泽东的这种手法，与他对刘少奇的处理很相似。1967年春节，毛泽东接见了刘少奇，刘提出自己放弃权力，回乡种地，希望毛结束运动，毛对刘说，犯错误么，改正了就行了，你要养好身体，准备工作。而实际上，他让手下的人发起了批斗刘少奇的新的新高潮，自己则有滋有味地一个人悄悄地看批斗刘少奇的录像。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几个人的处理方式，只是倒刘方式的历史重演。他的这一套手法，经过多次演练，已经非常熟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对待林彪，他采用隔山震虎、引而不发的方针。本来，是他亲自选定的党的接班人，党的副统帅，主副统帅之间有一点不同看法，可以坐下来推心置腹，至少可以交流，协商，但是，毛泽东表面上说，他要约林彪同志谈谈，但是，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经数次找毛谈话，毛都避而不见。1971年，毛来到南方各省，每到一地，不断地吹风，数说林彪的罪状，让各地大员与林彪划清界限。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章规定，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教导的党员之间彼此要在党的会议开诚布公解决矛盾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他老人家历来教导我们，要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他老人家历来反对在背后拉帮结派，煽风点火。这一次，他老人家又一次忘记了自己对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这一谆谆教导。他老人家还说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虽然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但林彪上门求见，见一下又无妨？你对刘少奇恨得咬牙切齿，还接见过他呢？林彪是你亲自选定的副统帅，为什么三番五次地避而不见呢？见了面，不就可以充分交流，消除分歧或者消除误会吗？即使林彪不找他，你党中央主席也可以直接找你自己定的接班人、你的副统帅沟通谈心？他老人家在与副统帅有分歧的时候，就忘记了在自己的伟大的著作中记载的自己的伟大思想？毛泽东同志又一次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教导。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悖论。

就这样，毛泽东决意用对付刘少奇式的办法处理林彪和支持他的一些人。毛泽东刻意要恶化矛盾，终于，导致了林彪出走，他挑选了接班人，又逼走了接班人。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可见，林彪事件的产生，毛泽东是有责任的。如果他按照党章办，如果他有一点民主风范，统帅和副统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可以避免的。

#### ◇ 关键在于树大招风

林彪无权欲，无物欲，也无色欲。从他的处世方式、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他无意于权力的角逐。他对有着极大的权力欲和其他欲望的毛泽东本来是不构成威胁的。但是，后来毛林之间，为什么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呢？

毛泽东在九大后忌恨林彪，有其心理学根据。他患上了权力狂热症、权力威胁恐惧症。

第一，他对权力的疯狂追求和疯狂护卫使他把当年的战友都看成了敌人，他几乎仇视所有当年的战友。任何有功于他、有恩于他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他必欲置之死后而后快的对象。刘少奇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他因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含蓄地批评了毛而被毛恨之入骨，刘少奇专案组和中南海的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派对刘的虐待，没有毛的怂恿，这是不可思议的。刘死的时候，没有穿裤子，胡子头发如乱草，并且有意安排在他生日那天听到将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和开除出党的广播。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伟大战略步骤”的一部分，是他老人家精心安排的。他一点也不想想当年七大上刘少奇曾经帮过他大忙。彭真是第一个喊毛

主席万岁的人。因为在他主管的北京市不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还说了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就被罢了官，被批斗了无数场次，被关在秦城监狱十来年，并且一门遭灾。彭德怀曾指挥过延安保卫战，为他解忧，到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也是一个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彭德怀早已被他打倒在地，不构成对他权力的威胁，毛仍然将他苦苦地整死。他已经有了仇恨癖。对林彪也是这样，不会因为在文革初期你帮助过他而有一种感怀之意，一句不合，心生恨意，而且不是小恨，而是大恨，是必欲置于死地的极恨。这种对人态度，已经成了毛泽东的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他老人家宁可负人，不可人负他。这一点，与曹孟德先生有点相似。

第二，毛对权力已经变得无限敏感。任何可能会影响他的权力的人、任何力量渐大有可能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的人，他就要除之而后心安。对林彪是这样，对周恩来也同样是这样。周恩来对毛忠诚勤恳，但是，毛照样整他，毫不手软。利用伍豪事件向他施压，利用中美谈判整他，利用风庆轮整他，利用批林批孔整他。最后，在周恩来患了癌症之后，他也坚持不让他及早动手术，周的病被毛拖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周瘦得只有60多斤。对此，周心里是明白的。对周的忌恨，是因为有一批行政官员跟他。对林的忌恨，是因为林手下的几员大将是林彪部下，黄吴李邱在军队中又掌了权。毛担心权力会受到威胁。当时人们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话让毛很不高兴，说“缔造军队的人就不能指挥军队了？”林和四野政治地位的上升，对于深谙权力之道的毛泽东来说，看到了他的权力和权威可能会遇到潜在的威胁。他看到林彪声望和四野在中央力量的上升，这种力量已经使他内心不再安宁了，因此，除掉林彪，势在必然。顺便说一句，后来邓小平突然对他忠心耿耿的杨家将开刀，其心理因素与此颇有几分相似。

林彪当然不是没有错误。这里所说的他的错误，既是指对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的错误，也是指导致自己悲惨结局的错误。我认为他的最大错误有两个。

一个是上了文革这条船，成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工具。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刘少奇倒了，林彪自己自然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在刘少奇被打倒后，自然就成了等着被烹的走狗了。他在文革中的红极一时，也给他带来了后来的危险。他入伙文革，尽管他不愿意，是毛强拉入伙，但是，毕竟他成了毛的亲密战友，成了文革的红人。文革是不得人心的，文革中有大批大批的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人的内心必然是反对文革的。林彪在文革中的被拉入伙，使他很容易地成为人们怨恨的对象。按照心理分析，文革的不幸者、受害者对于文革的得益者、获利者、幸运者很容易处于对立的心态。文革是毛发动的，他应该对文革的后果负最大的责任。但是，由于很复杂很现实的原因，人们不敢恨他，不想恨他。直到文革结束了，人们还是维护着他。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痛责小鬼，保护阎王。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人们不会把责任、仇恨对准真正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而会集中于在文革中走红的林彪、四人帮。林彪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拉入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受到文革伤害的大批人的仇恨对象。文革打倒一大批，这是毛泽东的责任，并不是林彪的责任。但人们喜欢说成是林彪和四人帮违背了毛的意愿造成的。林彪和“四人帮”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他被毛泽东裹挟着在文革中亮相、走红，在当时似乎是好事，实际上使他很容易成为文革的替罪羊。这是一步不走很难、走了很危险的棋。林彪避祸的最好办法，是继续治他的怕光怕水怕风的病，做文革的逍遥派。健康是第一位的，让伟大领袖和他的妻子、战友们将文化革命搞得翻天覆地吧，林彪最好的文革策略是不介入，养病他避祸的最好方法。

第二，林彪初期编辑了那本小红书——毛的语录，这本书推动了全国对毛的个人崇拜，对于现代中国的个人迷信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对毛的个人崇拜运动，也损害了林彪在中国广大民众中的形象，也造成了他是文革得益者的形象。他对毛的个人迷信把毛送上了神坛。当他带头创造的这尊大神反转手来对他进行迫害时，林彪就陷入极大的被动。你树了毛的绝对权威，也

就增加了神打倒你的份量。而因为你造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神，创造了一个被称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的人，他要打倒你，人们就会认为神是正确的，你就成了神坛的祭品。你要反对他，你就自己将自己处于挫败的地位。刘少奇曾经犯过这个错误，林彪也犯了这个错误。而造神的凡人最容易冒犯他自己创造的大神，最容易被神用来祭刀，然后将他供奉在神坛上作为祭品。

今天，在几十年后再看林彪事件，从根本上说，林彪事件是人为的党内斗争的产物，是中国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反党事件或者反革命事件中的一个普通事件而已。它是由于中国和中共党内缺乏民主风气造成的。如果有民主风气，对刘少奇用得着这样搞吗？党内自由辩论不是更能分清是非吗？对林彪事件也是这样，完全可以充分地交换意见，民主表决，有必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对自己的亲密战友和高级干部用镇压、逮捕的办法吗？如果有一定的民主制度保证，就决不会出现所谓的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就不会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不会有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与毛泽东晚年多疑的心理疾病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很多，冤假错案之多，我猜想一定雄居世界第一，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晚年，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心理病人。他的心理障碍，如多疑、刚愎、封闭，权力无限，一点小事很容易风声鹤唳，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演化成挖出一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来。中国人的创造性不同寻常。中国人不仅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而且还发明了把自己看不惯的人打成反党集团、野心家的接二连三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造成中国所谓十次路线斗争，造成文革中一亿人受冲击的世界史上的奇观。中国缺乏民主的机制和民主的风气，一国由一个党说了算，一个党又由几个人说了算，几个最有权力的人中又只有一个领袖说了算。领袖虽然伟大，但是，他毕竟不是神，他是凡人，他有六情七欲，他有认识的偏差，加上他老迈，心理有障碍，整天被几个小女子和小男人围着。有着无限权力、又有着心理疾病的他，让国家听命于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会产生种种问题。林彪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人也许会说，林彪是反革命集团，这已经是铁案如山了。你这是为反党集团鸣冤叫屈。铁案不铁案，要由历史来作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评论是非的试金石。当年，胡风案、61个叛徒案、反右案、彭德怀案、刘少奇案，以及千千万万个大冤案，一个个都是“铁证如山”的。许多案件是伟大领袖亲自定的，亲自批的。可惜，那如山的铁证，仍然禁不起历史的检验。铁山其实只是冰山，大虽然很大，但是太阳一出来，就容易融化。我们对历史应该抱着一种负责的精神，努力去澄清历史事实，廓清历史迷雾，认识历史真相。当然，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材料有误，或者观点有错，如果确实证明我错了，我觉得也没有多少坏处，它至少可以深化人们对林彪事件的认识，推动人们对文革史的研究。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包括林彪事件，是不应该掩盖起来的，是需要认真地清理和研究的。

~~~~~

## 【追忆前辈】

王年一同志是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阎长贵 •

受“德艺双馨”概念的启发，我生造了一个概念，叫做“德学双馨”。不知能否成立？不管成立不成立，我先用一下。我觉得，王年一同志就是一个德学双馨的学者和专家。在“德”的方面，他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近60年的时间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说：“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又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文公的话是

我的座右铭。”我觉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道德高尚不高尚？确实高尚。在“学”的方面，我认为，王年一同志是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垫基人。而他不仅是开拓者和垫基人，而且在科学研究文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因此可以说，到现在为止，王年一同志在文革研究中的地位，还没有人可比，没有人可以替代。所以，王年一同志的逝世，是文革学和文革研究的重大损失。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对王年一同志最好的悼念和纪念，就是认真学习他研究文革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把对文革的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改变“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状况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王年一同志研究文革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什么呢？在学习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在同他的交往中，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 他勇于面对困难，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我听他说过，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久的时候，教研室分配任务，没有人愿意承担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他作为教研室的负责人承担了，从此他也就开始了研究文革的历程。1986年或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约写几本党史著作，他自告奋勇担任了写作文革这一部的任务，并比较快地交稿了，这就是他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出版。严格地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意义上的文革史著作。到现在已再版了两次（1992年和2004年），印刷了六、七次。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应该说，二十年来，长盛不衰，其价值和意义越来越明显。大概是去年，日本要翻译他这本书，给他10万元人民币，但要他到日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他因为身体不好拒绝了。《大动乱的年代》这本书很有独立见解，这也是它受到国内外欢迎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这正如他后来不只一次说的，如对“五十天路线”批评不够，对“联动”评价过高，等等。但从总体上说，从根本上说，这本书体现了“秉笔直书”的精神。王年一同志依据“秉笔直书”的精神写了大量关于文革的著作和文章，毫不夸张地说，其著作和文章是文革学的宝贵财富。

（二） 宏观研究和微微观研究相结合。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俗话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子的。”又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说宏观和微观要相结合。在研究文革中，王年一同志不仅着重研究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原因和文革发展大势，还注意考查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即所谓“个案”，比如他对上海“一月夺权”问题、严家其等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的研究，都是非常细致的。所谓“宜粗不宜细”，这可以是处理政治问题（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但决不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原则。王年一同志非常强调“以小见大”，他常能从人们所熟知和耳熟能详的问题中看出和分析出大问题、大道理。比如，他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和“向党中央进攻”大家都知的两句话中分析出毛泽东把自己放在党中央之上和独断专行，从而证明他“所打击的是整个中央”。他告诉我这是一个研究文革值得提倡和注意的原则和方法，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

（三）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突破禁区。学术研究本来无禁区。但在我们中国学术禁区很多，特别是文革研究；而在文革研究中，又特别是林彪问题和事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十多年前，王年一同志就大胆地提出了对林彪问题要重新认识。这是石破天惊的论断。2003年海外出版了一套叫做《重审林彪罪案》的书，据统计，王年一同志写的文章以及他和别人合写的文章大概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可以说，王年一同志的观点是这套书的灵魂。这套书在海内外影响和反映很大，其作用不仅增加人们对林彪的真正认识，更重要地是推动了对林彪问题和事件的研究。这种敢于突破禁区的精神，在文革研究中，在一切问题的研究中都太重要了，垦切希望它在我们国家能成为一种时尚。

（四） 热心提携青年。文革研究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在文革研究中，王年一同志对别人的研究，特别对青年人的研究非常重视。他热情鼓励他们，他带病给他们的著作写序言。这几年他给多少人的书写了序言，据我知道和看到的就有给何蜀、舒云、陈小雅等等

的著作写序，有的人还不只一篇。在三年来王年一同志给我的 1 0 0 多封信中赞扬过在座的和不在座的许多人，如林蕴晖、萧冬连、郑仲兵、李宇锋、吴迪、舒云、何蜀、陈小雅等等同志，他希望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把文革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五）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认为研究王年一同志研究文革的精神和方法是提高研究文革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文革学”中应该提倡和注意研究王年一的文革思想。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何蜀同志表示赞同，我也请大家考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